

刘伯承和他的战友们

- 百年的风风雨雨
- 百年的电闪雷鸣
- 百年的金戈铁马
- 百年的血乳交融
- 百年的风流倜傥
- 百年的辉煌人生

刘伯承元帅诞辰100周年题记

(1892—1992)



目 录

三年交友 情系终生

——刘伯承与杨闇公……………陈石平（ 1 ）

师生情谊 长存天地

——刘伯承与吴玉章……………陈石平（ 48 ）

✓布衣元帅的金兰之交

刘伯承与朱德……………陈石平（ 86 ）

✓十三载岁月匆匆 万世名赫赫永垂

——刘伯承与邓小平……………谢戈、王秀英（ 129 ）

✓昭昭青史连帅府

——刘伯承与徐向前……………朱 玉（ 218 ）

✓数度联袂征战 几多风雨同舟

——刘伯承与聂荣臻……………陈石平（ 236 ）

✓高山对大海的呼唤

——刘伯承与陈毅……………甘耀稷（ 273 ）

✓坦荡荡的元帅心

——刘伯承与叶剑英……………蔡仁照（ 294 ）

太行悲歌 情深似海

——刘伯承与左权……………谢 戈 (307)

戎马生涯紧相随

——刘伯承与李达……………谢戈、王英 (332)

战将如云谁识君

——刘伯承与陈赓……………郭若冰 (355)

统帅令如山，战将起“疯劲”

——刘伯承与王近山……………孙 国 (373)

硝烟炽烈真情在

——刘伯承与陈锡联……………沈兵、孙国 (397)

三年交友 情系终生

——刘伯承与杨闇公

陈石平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多少有那么一点缘分。刘伯承和杨闇公的交往，就有那么一点缘分。

那还是1923年秋后的事情，刘伯承在川军中任团长、熊克武部队的前敌指挥官，战功赫赫，威震全川。可是，在大足一役中身负重伤，几乎丧命。在成都养伤期间，吴玉章对刘伯承十分关怀，不但请医、买药，还介绍先进的书籍给他阅读。最重要的是，介绍了一位影响刘伯承人生道路的朋友。

有一天，吴玉章领来一位穿着半旧西装、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满脸带着微笑的青年人，热情地给刘伯承介绍说：“这就是你要请的杨闇公。”

刘伯承左眼放着异彩，尽力支起身子，热情地说：“久仰、久仰。读过你的一些文章，又听到吴校长的介绍，很想见一见。”

杨闇公沉静地回答：“刘长官是威震全川的传奇人物，我只是个失业的青年。”刘伯承不等他说完，便诚恳地讲出心里话：“我是请你来当先生的，不必过谦。记得讨伐袁世凯的

时候，你在江阳炮台策划官兵起义，朝野为之震动，你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出色表现，在留学生中是人人称颂。……你所宣传的思想利器，看来要比我的队伍高明得多，我才向你请教嘛！”

杨闇公，名尚述，是四川潼南人，比刘伯承年小6岁。他虽然出身在封建地主家庭，但早就对旧社会和旧教育不满。少年时就冲决家庭罗网，远赴南京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曾参加反袁活动，遭到当局通缉。1917年被迫东渡日本，先进入成城学校，后又学习军事。在日本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杨闇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回国以后立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活动，并留心物色革命人材，酝酿建立革命组织，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今天，他正是到刘伯承处探访和了解情况。刚开始时，杨闇公显得有些拘谨，但刘伯承坦率、诚恳的态度和饶有风趣的谈话，使他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距离渐渐缩小，思想逐步靠拢。

当时，刘伯承不仅身负重伤，而且思想上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刘伯承自1911年从军以来，为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奋身投入战争之中，先后参加讨袁、护国、护法讨贼诸役，屡立战功。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所参加的战争，虽然或多或少推动了时局的转化，虽然他主观的愿望是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但在实际上却没有真正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甚至于还卷入到军阀混战之中。为此，刘伯承十分痛苦。平日他忙于军务，忙于战事，没有多少时间思考。静下来养伤之后，反倒使他有了静处、思索和交友的时光。

这两位有着不同经历的革命者在结识以后，相处十分投

机。由于精神上有了寄托，刘伯承的伤腿很快恢复了机能。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到杨闇公的住地——成都市娘娘庙街24号进行拜访。同杨闇公的广泛接触、谈心，是促使刘伯承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极重要因素。刘伯承曾经深情地回忆说：

“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这正是刘伯承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从此走上了崭新的革命道路。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近的政治见解，把刘伯承和杨闇公紧紧联系在一起。革命的友谊又促使这两个出身和经历大相径庭的青年人同行于一条道路。这一期间，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而且相会以后必定要作长谈，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追溯民族的历史，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乃至家庭生活等等。这一切都是他们谈不完的话题。1924年1月2日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十二年来的政局，固属愈趋愈下，而一般青年及受戟刺而觉悟的人，实在是很多。这个源流不断，虽国破家亡，终有复兴的一天。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不在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

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刘伯承和杨闇公在相互接触中，不断加深了了解。这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见面后则是一番畅谈，谈时局、谈战争、谈遭遇、谈理想，可以说是天南地北，无所不包。杨闇公在1月4日的日记写道：“十一时许与子鱼赴商业场，与

伯承遇于途。膳后赴仲铭新寓，谈至九时许始归。

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内心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

当时，四川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刘伯承作为刚出局的局中人，感受更深，看的也透彻。每每谈起，常令杨闇公等人入胜。在日记中，杨闇公记述道：“昨日伯承约了来吃晚饭……饭后同赴长发街看房子，在周觉生处小坐，旋即赴商业场。入夜至仲铭家，与赵君子次华遇，谈至九时半始归，内心犹不忍遽去。因伯承谈战事经过，使我有动于中。若能朝夕晤谈，甚所愿也。”

刘伯承所谈战局，有讨袁、护国、护法等役，其中感触最深的还是当时的讨贼战争。

1923年夏秋之交，北洋势力在四川接连遭到惨败，吴佩孚等北洋头目早已气急败坏。吴佩孚严令卢金山、赵荣华全力扼守万县，叫督战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不许队伍再向后溃退。同时，对战败的各路将领恩威兼施，一律不议处分，责令他们再次上阵厮杀，“将功补过”。吴佩孚又从湖北运进大批军火、饷银，驱使各路部队迅速反攻讨贼军。这样，颓丧的北洋军和杨森残部又象注射了强心剂一样，重新蠢动起来。杨森等人发出通电，拥戴在幕后活动的刘湘出山，推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一面伪装调停，提出“礼送北军出境”，一面则纠集所部和土匪“陈大眉毛”、“赵麻子”、“龙麻子”、

“郭老外”等乌合之众，分散讨贼军的兵力。西南讨贼战争又转入了紧张、激烈的阶段。

当刘伯承部在8月19日攻克大足县城的时候，沿东大路追击敌军的赖心辉部行动十分缓慢。这时，刘湘、杨森趁机集合兵力向隆昌进攻。黔军袁祖铭的3个旅约1万余人，也加入了北洋势力的行列。由于隆昌兵力单薄，且又指挥不力，在界牌、石鹅场一带激战两天两夜之后，被迫放弃隆昌，退到双凤驿一线。

隆昌失陷，使讨贼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为了夺回隆昌，熊克武又急调第2混成旅回头救援。刘伯承接到命令，赶忙把刚刚攻占的大足县城，交给余际唐部的陈、范两个团防守，自己带领部队奔赴隆昌。但是，敌军的后援部队已从土地坡捷足先登，向隆昌城内拥挤，一时人马杂沓，枪声四起，十分混乱。

由于战事频繁，第2混成旅根本得不到休整。因为前次移交给余际唐部防守的大足县城，又陷落在黔军之手，对讨贼军十分不利。1923年10月，刘伯承又奉命前往大足，准备再度攻取。敌军王天培部以逸待劳，在石桥铺之马颈口陈兵数千，据险而守。

刘伯承部再次担任主攻，第8混成旅郑英部担任助攻。对大足展开攻击。

战斗中，刘伯承感到左大腿象被什么东西猛击一下，回头看时才知道是大腿中弹，殷红的鲜血直往外喷。他怕部下看见，影响情绪，便自己低着头，用一根带子扎住大腿止血。待打退敌人进攻以后，才撤退下来。

当时，还不知道是动脉血管被打断了，准备就地医治一

下。后来，军医发现他负伤的大腿异常红肿，脸色苍白，声气微弱低沉，决定将刘伯承送到成都的医院抢救。这时在团部任军需官的王尔常闻讯后，亲自护送刘伯承到省城。

从大足到成都，有600多里的路程，当时又正是兵荒马乱，路途十分艰辛。经过3天3夜的长途跋涉，总算平安到达省城。当即送进成都北门外微生物医院进行抢救。并请法国人艾毓梅担任主治医生。

法国医生艾毓梅见病人伤势极重，立刻组织抢救。开刀进行手术。伤口切开以后，股动脉里的血，象喷泉一般，射出一尺多高。刘伯承当场晕厥过去。呼吸十分微弱，脉象几乎无法触摸。当医生在取出子弹以后，又转而进行急救。在左腿上连续注射了10多针，仍然没有转缓。刘伯承已奄奄一息。

王尔常见此情形，惊恐万状，焦急异常，一再请求医生尽最大努力抢救，并许以重金作报酬。于是，急得满头流汗的医生，又拿起电话，邀请在市内的另一位外籍医生前来协助。

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闻讯后，也急步流星赶到医院，焦急地嘱请医生全力抢救。一边坐在病房外厅静候消息。当听到刘伯承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熊克武手中的烟卷不禁失落，烟头在桌布上“磁磁”冒烟也未察觉。他知道蜀中这颗将星若殒落，今后的战局将不可收拾。

约一刻钟以后，另一位外籍医生赶来了，刚进门就指手划脚，用夹杂着英语的中国话喊道：“背上、背上，尾脊部有没有注射?!”果然是旁观者清，经这一提醒，艾医生才发现忙乱中的疏忽。接着，赶紧在刘伯承的尾脊部扎进一针，

意外地冒出了几点血珠。医生们兴奋起来：“有希望”“上帝保佑！”

过一会儿，刘伯承又有了微弱的呼吸声。在外间的熊克武听到消息，兴奋地立起身子，吩咐部下给刘伯承以优厚的待遇。刘伯承又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但是，由于天气炎热，当时又没有特效的抗菌素药物。伤腿在开刀以后，依然又红又肿，局部发生溃烂。医生担心地说：“病人伤势十分严重，这类病例通常都要截肢，以免血液中毒，出现败血症者，危及生命。”

不料几周过后，刘伯承的伤口日渐好转，红肿慢慢消退，连艾毓梅医生也惊奇地说：“这是上帝降福啊！许多病情比你轻的，都锯掉腿啦。你当终身祝祷，不忘上帝之恩。”

刘伯承微笑着说道：“上帝会爱无神论者么？！我的腿有好转，主要靠您的医术高明。再者，我每日凝聚精神，暗暗对着伤口下命令：快点好！快点好！这才有今天的样子。”又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刘伯承便离开医院回到成都刀子巷继续养伤。临别的时候，艾毓梅医生拿着一副拐杖前来送行，深表惋惜地说：“刘将军，你身经百战，战功赫赫，是同上帝见过几次面的人，活过来真是不容易。”

刘伯承直起上身，一面感激地点头，一面提出疑问说：“我现在还不能步行，要拐杖做啥子哟？！”

艾毓梅医生说：“你的腿伤虽然不久将要痊愈，但左腿必然萎缩，不能行走，让这对拐杖作你的终身伴侣罢！”

刘伯承听后，仰天大笑起来：“世上岂有挟杖而行的斗士啊！请把拐杖留赠别人吧，谢谢您的好意。”接着，又很有信心地说：“我会要站起来的！请相信中国人的骨头！”

艾毓梅看着眼前这个几度起死回生的伤号，深表怀疑地耸了耸肩膀，意思是：象这样的伤势还想站起来，简直令人不能相信。

刘伯承回家以后，每天坚持作伸腿运动，常常疼得汗水直流，甚至晕了过去，但他毫不气馁，从不中断。不久，竟然可以下地走路了。为了克服一瘸一拐的毛病，他下狠心把左腿搁在木凳上，命令卫士猛坐膝部，多少次疼痛得晕厥过去，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直到伤腿能比较自然伸直为止。

有一天，刘伯承专门步行到微生物医院致谢。艾毓梅医生一见，大惊失色地说：“这是哪一位神医给你正骨理经的？”

刘伯承满不在乎地说：“哪有啥子神医哟，我是用蛮办法，命令卫士给压直的。”

艾医生听后瞠目结舌，颇为感慨地说：“我素来以为华人柔弱，想不到中国还有象钢铁一样坚韧的军人。”

刘伯承的腿伤在渐渐好转，但整个讨贼战局却开始走下坡路。因为第2混成旅是四川讨贼军的主力 and 支柱，刘伯承又是第2混成旅的核心和灵魂。所以，当他负重伤退下火线以后，全军上下为之震骇。熊克武急忙派总司令部参谋长陈达三少将前往接替。同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

在前方阵地上，许多地方依然飘扬着“刘”字凤凰旗，官兵们大肆张扬：“刘伯承亲临前线！”“瞎哥来了！”报界也不时地传播，“刘伯承又往某处策划军事”的新闻。此外，军方还大量印了“刘伯承”的名片在前沿散发，借以威慑敌军……这些精神战法，在一些战场曾经发生过神奇的作用。讨贼军经过20多天浴血奋战，终于攻下了重庆。

然而，这种计策毕竟不能长期发生效应。不久，敌军方面欣喜若狂地披露出“刘伯承身负重伤，几乎殒命”的消息。随后不久战场形势急剧逆转，讨贼军内部也动摇不定，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

熊克武比任何人都急迫地希望刘伯承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再为他重整旗鼓，再振军威。在刘伯承伤腿疼痛的时候，熊克武叫人把自己的官轿送来，抬着刘伯承沿街“兜风”，装模作样让世人看看督军大人的豁达风度。

一些惯进谗言的庸俗浅陋之辈，看熊克武终日里如坐针毡，不思茶饭，只是念叨着“刘伯承啊刘伯承”，便劝慰说：

“锦帆兄，你手下握兵数万，可算得上谋士如云，战将如雨，老叹息一个残废人干啥子嘛？”

熊克武怒目圆睁，气呼呼地说：“你们懂得啥子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呀！我熊锦帆奉中山先生之命，只带了3个营的兵力入川。10多年来，东征西讨，苦苦撑持，已是万乘之军。没有刘伯承，哪有这样的声势？！哪有你们安享的富贵荣华？！”说着，显得十分激动而又颇为伤感地自言自语起来：“刘伯承系着万人心。他不归队，军心不定，战局不稳，吾心不安啊！”

.....

这次负伤，对刘伯承的身体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其痛苦的程度，并不比7年前在丰都右眼和颅顶受伤的时候轻松。大量地失血，使他的脸色苍白，浑身软弱无力。左大腿曾经长时间麻木，明显地萎缩……这一切，足以使意志薄弱的人从此躺倒爬下，一蹶不振。然而，刘伯承又一次奇迹般地战胜伤残，令人难以置信地挺起了胸膛。

战胜伤残需要顽强的毅力，挣断旧的罗网更需要胆识和决心。在这一阶段，刘伯承在同杨闇公、吴玉章的交往中，逐步接受了进步的思想，看到了中国的曙光和自己的前途。他想鼓起勇气向光明迈步。可是，这步履是十分的艰难。因为，他跟熊克武的队伍有着10多年血肉相交的情谊，自己曾为这支队伍拚力搏杀，而且有过胜利、有过辉煌，有过声誉，也有可观的薪俸。

朱德同志在回顾刘伯承和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象刘伯承这样一位智勇双全、身经百战，在四川军界享有盛名的军人，要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地位显赫，生活优裕，又与熊克武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旧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士义气，也曾许多军人身上发生巨大作用。熊克武、但懋辛等人都是老同盟会员，在推翻满清政府，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军界至高无上的信条。尤其是刘伯承右眼致残以后，熊克武并没有因此而见弃，这一“知遇之恩”更令人难忘。虽然在熊克武部待遇不公，遭人妒嫉和排挤，刘伯承却总是以德报怨，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于迟迟未果的讨贼战争，刘伯承更感到有一种不可推诿的责任。——一面是新的使命在召唤，另一面是旧的罗网在束缚。这便是1923年秋冬直至1925

年冬，刘伯承所处的复杂环境。

这一阶段，是决定刘伯承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是杨闇公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从两方面来说，仿佛是在拔河，一面是熊克武的旧力量在拉，另一面是杨闇公的进步思想在吸引。谁输谁赢，还真叫劲。当然，决定的因素还是在刘伯承本人。

当战况紧迫，重庆告急的时候，张冲旅长就急得束手无策，气急败坏地“通令所属各部队：临阵败退者，团长阶级军官就地自用手枪击死，营长定处大劈，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拒绝收容”。1923年12月3日，在刘伯承还卧床不起的时候，张冲就接二连三电催刘伯承赴渝指挥，以收拾危局。果然，到了12月15日重庆又复失守，整个西南讨贼战争明显转为败局。这时，熊克武、但懋辛、张冲等人催命更急。

刘伯承答复说：“对于讨贼，我理当拼死向前，可现在我的身体不好，一个残废人如何能领千军万马出征。”

熊克武说：“只要你躺在军中就行，我派几班轿夫轮流抬着。大家的事业，请务必出来扶持。不然，队伍实在稳不住，兵败如山倒呀！”

刘伯承真的有些动心了。第2混成旅是他多年来苦心培训的一支劲旅，他更担心整个讨贼之役的成败。为了消灭北洋势力，为了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刘伯承提出：“如果一定要我出山，非依从我的主张不可。否则，决不出山。我的改革大要：一是要放开手脚指挥，独立调度战争，率领部队，不与张冲合作。二是要大力裁撤无能的长官，使部队精简，能胜任艰苦作战。三是对部队施行革命观念的训导。不为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等等”。

当然，这些条条熊克武是不能全部接受的，熊部核心集团的成员也只不过是想要利用刘伯承的军事才能罢了，对这些改革条文，根本不可能应允。

熊克武虽然不答应改革，但仍一再催请刘伯承到寓所交谈，恳请出面任职。一天，熊部代表吴克坚上门探访，恳切地执意表示：“如果指挥官不出马，我是没法子回去交待的，请务必给点面子。”刘伯承干脆来个称病卧床。吴克坚虽是“牛皮糖”式的说客，但也毫无收获，只好悻悻地离去。待吴克坚出门，刘伯承又翻身跃起，和杨闇公等人谈论起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涉及到圣西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几个人互相辩论，一直延续到夜间。杨闇公清楚地看到刘伯承正在一步步挣脱旧的藩篱，逐渐向共产主义靠近，心内不禁暗喜，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今日的病非真病，有故而发也。”

又有一天，杨闇公到刘伯承处交谈以后，他们一起到商业场散步和购买物品，准备过年。下午5时，当他们返回寓所的时候，张冲哭丧着脸找上门来，苦苦哀求说：“伯承兄，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你不出面，后果难以收拾呀！看在多年交情、辅车相依的份上……”

刘伯承也平心静气地说：“亚光（张冲字）兄，人心都是肉长的，并非我见死不救。正因为是千钧一发的时候，我才提出改革的根本大计。如果情形依旧，扶棺上阵也只能屈死沙场。何况我伤体未愈，前途难以预料。请向锦帆（熊克武）先生转告：一军系已是强弩之末，如不从大处着眼，来个脱胎换骨，就是请来神仙军师诸葛亮，也是没有指望的。”

四天之后，但懋辛又派黄圣祥来“劝驾”，请刘伯承到府宅

“商谈军事，共扶危局”。刘伯承本不愿说客出动，杨闇公在一旁劝解说：“但先生多次来人催请，还是礼节性地走一下罢。”这样，刘伯承才勉强去了一趟，谈话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这段经历，杨闇公曾记录在1月21日的日记中：“……与子鱼赴伯承处，与他遇于途间。同归他的寓所，谈及他的情形和近日的现状，都很抱悲观。唉！忌才二字的关系，从古至今不知湮没了多少智能之士哟！二时许，黄君圣祥来访伯承，劝驾而来，促其赴但（懋辛）处，共抚危局。我也从中怂恿其往教，于是他与黄君同去。……

刚吃饭后，伯承来寓。饭后，杂谈至九时许始去。此君子遇事留心，真罕见的人才！”

刘伯承在杨闇公吴玉章等的影响下，积极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努力阅读有关社会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刘伯承不断追求真理的变化，是杨闇公等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科学在中国扩散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四川的许多先进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成都发表了《列宁与中国革命》、《评国民党政纲》、《青年工人运动的注意事项》、《何谓国民革命》、《造党》、《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农村运动》等重要文章，内容大多是立足四川、面向全国，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当时，由于党处于秘密时期，成都的一些先进分子未直接和党的组织发生联系。但他们在党的影响下，根据革命形势的要求，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团体。1924年

1月12日，吴玉章、杨闇公等在成都高等师范秘密建立了一个叫“中国Y.C.团”的组织，有20多人参加这个组织，先简称为“C.Y.”（“中国青年共产党”四月改称“Y.C.团”）。4月中旬，吴玉章发表了题为《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演讲稿，较为全面地阐明了该组织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他们还在成都外国语学校编辑出版了《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该刊第一期是“追悼列宁号”，刊登有《列宁年谱》和一些悼念列宁的文章，还刊出了《中国Y.C.团的纲领》等重要文献。肖楚女撰文评介《赤心评论》说：“这是一种激进的青年刊物，第一期为追悼列宁号，介绍列宁很见热情。”同时又指出：“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有列宁的感情的人，并不缺乏什么；缺乏的是他那种广博的知识，坚强的信仰，沉毅刚勇的态度，应付时代和物质条件的才器。”5月1日，杨闇公在成都少城公园“S.Y.”和“Y.C.”联合召开的纪念列宁群众大会，到会有五千多人。会上，杨闇公讲演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并当场揭露了四川军阀压迫人民的罪行。这是在党的领导下，“S.Y.”和“Y.C.”两个组织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对团结革命力量，凝聚马克思主义势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川中先进分子的革命活动，刘伯承是积极拥护并热情参加的。有时因腿伤行动不便，杨闇公等人就把外间的情形向他通报。

看到刘伯承思想的变化，杨闇公十分高兴。当时，“中国Y.C.团”的一位青年见此情形，就性急地动员刘伯承加入组织。刘伯承真诚而坦率地说：“你们的组织我以为是很有前途的。不过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